

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讨论

——‘厦门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曾少聪

由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海洋与环境学院和厦门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厦门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11月15日至17日在厦门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德国、意大利、法国、菲律宾等国家，以及国内和台湾省的专家学者100多人，提交论文80多篇。这次研讨会着重于海洋科学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沟通，力图寻找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就中国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中国与西方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比较和应吸取的经验教训、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等问题进行讨论。涉及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有以下一些问题：

1. 时代使命和前瞻意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水平仍相当低，发展速度也比较慢。究其原因，与我国海洋法规不够完善，全民海洋意识淡薄有很大的关系。这势必对我们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兴旺造成不良的影响。由于缺乏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了解，往往造成认识上的偏颇。如认为古代中国虽有远洋航海，但都是非经济性和非民间性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本质是海洋农业文化，等等。下个世纪是“海洋世纪”，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加强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是时代赋予历史研究者的使命。由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涉及的面很广，我们必须拓宽视野，采用科际整合的方法，对海洋社会、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海洋社会经济与内陆社会经济的互动等问题进行全域性的研究。这不仅有利于重构中国的历史，加深对中国历史多元性的认识；同时，也有利于营造全民族关注海洋发展的氛围，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和投入到中国海洋发展的洪流中。

2. 海洋渔业。在中国海洋经济史上，渔民是海洋开发的主体，渔业历来是最重要的海洋产业之一。当代渔业史学者普遍认为，明清两代海洋渔业的发展是“向下的，倒退的”，因为“明清两代，南从粤东起，中经福建东山、浙江舟山、江苏连云港，北至山东辽宁间所有海岛，悉数荡平房舍，驱民迁徙”，“这种海禁、迁界暴政，使海洋渔业的生产基本上陷于中断”，“两王朝两次倒退统治，严重地破坏了隋、唐、宋以前的经济基础，致使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现代渔业长期难产”。与会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明清厉行海禁之时，沿海渔村的渔业人口在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出现了分化，即一方面向内陆化方向发展，一方面仍向海洋方向发展。在向内陆化方向发展道路上出现岔口：一道是由海洋捕捞向海水养殖业方向进军，走的仍是渔业之路，充当的仍是渔民的角色；一道是由渔业向农业进军，走农耕之路，充当农民角色。前者促进了中国养殖业的发展，而后者的人数则比较少，当海禁松动时，他们又奔向海洋。从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的规模和产量来看，明清时期中国海洋渔业并没有倒退，反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前发展。

3. 海洋航运。海洋航运是海洋经济的前提和基础，福建海洋航运业在中国航运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福建航运业的兴衰是中国航运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关于福建航运史，与会代表提出了以下几种看法。第一，是处于边陲地带，或是处于中心地带更有利于中国向海洋的发展？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越是边缘地带，中央王权越不易控制，海洋因子就越容易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南宋朝廷南移，福建靠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促使福建向海洋的发展，例如泉州港的兴盛是从南宋开始。第二，以漳州月港的兴起为例，说明地方官吏对海洋航运的认识和支持，是海洋航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把海洋航运和海洋人文结合

起来,认为地方的海洋人文,特别是趋利目的和冒险精神,促进了海洋航运业的发展。第四,要吸取泉州后渚港和漳州月港变成废港的经验教训,注意港口环境的保护,确保航道的畅通。

4.海洋贸易。海洋贸易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是发展海洋经济的重心。以往关于海洋贸易的研究,对口岸及腹地的情况、商品的种类、海商的经营方式、船只的型制以及水手的分工等有较多的描述,而对船只离岸后航行的贸易情况,因为资料的缺乏,就了解得比较粗浅。在讨论中,有的学者利用《历代宝案》的记载,重构潮州商船离岸北上航行贸易的具体场景,指出从澄海运糖到天津,最后从奉天运豆类回潮州,往返大约半年的时间。这是当时潮州商船在每年下半年常走的贸易路线。一些学者认为应从海难史的角度研究海洋贸易。环中国海沿岸的国家和地区,官方和民间的史料,都有关于海难事故的记录。海难记录牵涉的范围极为广泛,如违禁走私、国与国之间的交涉、对船只的大小、人数、船货、航路、遭难的原因、地点、救助抚恤过程,以及飘流地的见闻,均有详细的记录。搜集各地留存的海难史料,实为研究环中国海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流、航运、气象的基本工作。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无疑地将加深对环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认识。有的则提出近代中国海关保存下来庞大的、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是中国近代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研究海洋贸易,应重视海商行为和海商心态的研究,正是海商的趋利动机,以及在这种动机驱使下的互动行为,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海洋发展。

5.海洋移民。海洋移民是中国向海洋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海洋移民基本上是沿东、西洋航路进行,遍及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环中国海周边国家和地区。一些学者提出应突破从区域史的角度研究国内的海洋移民、从华侨史的视野研究海洋移民国外的局限,把海洋移民放在国际移民的大背景下,作整体和综合的研究。关于海洋移民的讨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海洋移民发轫于沿海地区,作为过渡区域的闽西和粤东,许多人直接参与海洋移民活动;另一些人尽管仍在当地生产和生活,也已与海洋活动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讨论海洋移民的区域,不仅要重视“向外用力”的海洋发展区域的研究,而且也要注意内陆向沿海过渡区域的研究。第二,虽然台湾比菲律宾更靠近大陆,但大规模海洋移民台湾却比移居菲律宾迟,这是因为西班牙殖民者东来,菲律宾比台湾更早开发,较早地具备容纳移民的条件。第三,移民台湾以闽南人和闽西及粤东的客家人为主,是因为在靠帆船航行的时代,风力和潮流对帆船航行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闽南、闽西和粤东的出海口,位于春夏往台顺风、顺流的有利位置,而闽东和闽北春夏船航却反之,遂形成台湾移民以闽南人和客家人为主的局面。也有人认为:闽东人很少移居台湾,与闽东的移民传统有关,例如福清人更多地移往日本。第四,海洋移民的动机不同,往往造成移民经济发展的差异。移民台湾大多希望永久性定居,所以比较重视发展农业,其经济活动以土地开垦为主;移居菲律宾大多属于暂时性移民,以经商为主,因经商周期短,收效快。第五,有的学者指出:散藏于海内外的民间史料,例如族谱、契约文书、帐簿、墓碑、华人社团组织的纪念特刊,华侨西归录(记录华侨仙逝的档案),等等,隐藏着丰富的海洋移民信息,这是研究海洋移民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6.港口城市比较。对不同港口城市的比较,是这次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之一,比较的目的在于吸取经验教训。第一,对厦门港和高雄港发展史进行比较,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厦门港和高雄港的兴起均肇始于明郑时期,与郑成功收复台湾有很大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厦门与高雄的港口经济难分轩輊,在以后数十年间,由于腹地经济发展的差异,两地之间的差距渐大。第二,就厦门港与香港比较,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香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南海小渔村,逐步演变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国际大都市,除了良好的港口条件和广阔的经济腹地之外,实行自由港政策、以及完善的港口航运系统和发达的航运业等,构成香港经济腾飞的基础。第三,将厦门市与美国旧金山市进行比较,指出旧金山之所以形成大都市区局面,是由于美国优先发展大城市的策略所致。美国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超越原有的地域界线,向周边地区扩展,将其纳入城市化轨道,并与中心城市紧密相连,融为一体。这种以地区经济一体化为特点的大都市区化已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与周边城市联系的程度,厦门市远远不如旧金山市,这限制了厦门市的发展。第四,港市人文是港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大陆人文与海洋人文互动网络的焦点,是海洋人文活动最经常、最活跃和最集中的地方,是海洋人文发展的基地。

7.福建海洋发展传统。自古以来福建就一直具有向海洋发展的传统。古代福建的先民是闽越族,以海为

生,善舟楫,其活动范围遍及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地区,它是我国古代海洋文化的缔造者之一。关于闽越族与福建海洋传统的讨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意见。第一,一些学者认为分布在福建沿海和沿江地区的民是闽越族的后裔,另一些学者则针锋相对,否认这一说法。第二,妈祖(天妃、天后)崇拜是否起源于闽越族的信仰?一种看法认为妈祖是唐宋之际形成于福建沿海地带的航海保护神,因而与福建土著——闽越族有密切的关系;另一种看法认为妈祖信仰根植于汉人的文化传统,与闽越族没有什么关系。第三,福建的海洋文化特征表现在福建海洋发展的诸多方面,这一连串现象构成福建海洋文化丛,考察福建海洋文化丛的表现和特质,为研究福建文化所不可缺少,对重构中国的海洋文化也将有裨益。

与会学者认为,无论是历史、现在,抑或是将来,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海洋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能否有效地开发、利用和保卫自己的海洋国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面对21世纪“海洋大发展”的新时代,史学界应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

作者:曾少聪,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

(上接第104页)

2.48倍、高粱的1.4倍,1986—1990年平均玉米、大豆、谷子、高粱亩减税纯收益分别是81.63元、49.73元、50.01元和46.47元,从而促使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占全省粮食总播种面积的比重提高,由1979年的44.3%上升到1995年的60%,而大豆面积占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下降,由50年代中期的21.3%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4.5%。吉林省玉米带的形成,又使高产粮食作物比重大为增加,这对粮食总量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大豆生产的萎缩也不可忽视。

总之,南北方之间粮食流向的转变,由南粮北调演变为北粮南运,其直接致因是南北方粮食生产发展与消费增长及结构不适应,究其生产发展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在南北方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不同的背景下,粮食生产在南北方区域经济发展中比较优势上表现出差异,南北方按照各自区域的利益格局重组资源,以及国家在宏观上对粮食生产支持乏力的结果。缓解南北方之间粮食远距离大量流动,要针对这些成因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作者:郑有贵,1963年生,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主任。